·青年学者论坛·

DOI:10. 20004/j. cnki. ujn. 2026. 03. 017

新时代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外来者形象

汪静波

[摘　要]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乡土书写中出现了大量乡村外来者的人物形象,这些外来者大致可分成五种类型:政府挂职、技术支农、资本下乡、教师支教和自发返乡。他们不仅为乡村建设提供了多种资源,也在个体精神层面实现了自我价值,推动了城乡文化的双向发展。这种种"外来者"下乡后的文学书写,使得新时代长篇小说中的中国城乡关系由过去界限相对分明的二元结构转向交融共生,"乡下人进城"与"城里人下乡"的人物主体均已依据切身需求,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各取所需,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趋向平等的新阶段。

[关键词]新时代文学;乡村外来者;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

有别于以往"乡土中国"对村庄因循守旧、缺乏流动的文学书写,当今农村题材的文学中,乡村已出现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者,他们在村庄进行乡建、旅游、考古等活动,有时甚至对村庄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乡下人进城"与"城里人下乡"而多次形成大规模的流动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生原因与驱动力量,但每次"流动"之后,外来者在有别于"故乡"的异质性文化环境中,以诸种作为程度不一地推进了"城乡文化"的双向发展①。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乡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其间互动关系亦更为复杂。1990年代迄今的文学作品中,较常见的是"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模式②,大量文学作品因其所描绘的乡人为"由乡入城",以致文本视角自然地随之确定为"以乡观城",他们在主体身份上致力于融入城市,但其情感依归却仍为"在城望乡",由此几乎"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个体生命联系最为广泛的命题"③。然而,随着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诸多人力资源正在从城市"反向虹吸"而注入乡村,并为村庄提供滋养,与此对应,新时代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乡村外来者"的文学叙事,以《宝水》《经山海》《神圣婚姻》等作品为样本,可以见到种种村庄外来者的人物塑造:挂职干部如萨志山、乡镇基层治理者如吴小蒿、投资商如万成旅游开发公司的顾总与娄婷婷、支教老师如程田田、为治"心病"而返乡经营民宿者如地青萍……他们依据不同的早年生活经历,怀揣"各有所求"的人生目的决定"下乡"。若将之放置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的视域之下,来考察此类文学画廊中的多种新兴人物图谱,或可更深入地剖析新时代长篇小说独到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译丛'与新中国初期世界文论知识的中国建构(1949—1965)"(项目编号:2024EWY001)。

[作者简介]汪静波,上海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邮箱:emilybowang@foxmail. com。

①王光东,周海波:《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城里人下乡"及其叙述形态》,《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②参见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③卢桢:《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一、“乡村外来者”的不同类型与城乡资源重组

新时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大量乡村外来者，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我国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等人力资源和扶贫资金大量向村庄注入[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萨志山、吴小蒿、顾总、孟胡子等诸多“依时而动”的下乡人物，各自表征从外部源源不断注入乡土的多重资源，构成文本中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力量，他们时而互为支援，时而相互斗争，时而以“一人身兼数职”的某种复合型存在涉足乡土，构成新时代文学新人物画廊的谱系。

第一类重要的“乡村外来者”人物形象，源自政府规划的挂职干部。萨志山、吴小蒿以及老藤《草木志》中的“我”等，均是由政府从省城下派，致力于统筹、规划与落实“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有别于“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简单化认识，若将《神圣婚姻》中的安岭常委副市长萨志山、坝田村驻村第一书记潘高峰与《经山海》中女镇长吴小蒿的言行进行对读，会发现下派的“领导”与“基层”实则在从不同维度进行思考与开展工作，构成领导致力于统领全局与整合资源，基层则致力于上传下达与具体落实的组织性合力，由此形成某种沟通地方本土、全国城乡乃至联通海外的统合性复调。萨志山在招商引资方面一年到位市外资金690亿元，并在文旅领域令安岭灯会“由区域性品牌走向了国际”，一年中“在国内已经举办了104场灯会，在海外也举办了35场”[②]。若缺乏此种站位高远的认知，与追求“城市和乡村拥有同样的未来”[③]的阔大胸怀，仅凭吴小蒿、潘高峰等挨家挨户地说服村民服从拆迁工作，又或体贴入微地落实困难群体“吃低保”与春节时为之送上饺子，尽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上级指示、改善村民生活、甚至引来美国考古专家的丹墟遗址，但绝无可能直接拍板到位数以百亿计的资金，并使本土的文旅资源直接转化为海内外文化交流的一场场大规模活动。须以领导萨志山的“全球性眼光”与志在崇山峻岭，辅以基层吴小蒿等蒿草般不屈不挠的韧性，合力达成既顽强又柔化的“无孔不入”式本土工作方式，方能真正令乡村振兴的每项工作得到效益的最大化，又真正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广大村民间落到实处。《神圣婚姻》中百余场由外来干部萨志山组织推广的“灯会”，可视作文学领域中城乡皆能汇聚光明的象征性符号，现实中的政府干部以大量的务实性工作一次次“点亮城乡未来”，借助“灯会”这一文学意象得到精准而引人回味无穷的文学性呈现。

第二类“乡村外来者”源自技术支农。他们作为乡建专家、潜水专家、考古学家等，表征着乡土所亟需的某个特定领域的深厚知识，为政府推行落实各项振兴工作提供智库性质的智识援助。以《宝水》中的乡建专家孟载为代表，这位“真懂农村”的知识分子，以其对新时代乡建至高深而至细微的谋略、胆识与筹划，为孟子的那句“厚德载物”进行了富于当代意味的释读——今日的君子之“德”一方面在于品行，另一方面则在于深切掌握了事务运行的规律而能真正驾驭万物。在追求“城市与乡村拥有同样未来”之时，孟胡子提出了更为切合实际的乡建思路，他认为，“把乡村当作城市做，把乡村标准跟城市标准看齐，这样的乡建思路有问题”[④]。一味以城市作为样板，强行令乡村向之靠拢，一方面并不贴合乡土的实际需求，像城中人般为建筑物贴瓷砖，在乡下“风大土多，两天就给你弄得灰塌塌的”；另一方面也丢失了乡土原生的本土特色，在宝水村中的“清水墙那才是冬暖夏凉”，城里贴砖的“那个花哨劲儿，把咱的好景儿都搅和乱了”[⑤]。政府干部萨志山所追求的城乡

①参见董磊明，谢梅婕等：《故乡可安身：古源村的扎根型城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②徐坤：《神圣婚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61-262页。

④徐坤：《神圣婚姻》，第265页。

②乔叶：《宝水》，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61页。

④乔叶：《宝水》，第483页。

“同样未来”,是一种在融合发展之后,市民乡民皆能“生活更美好”的宏观需求,孟胡子等专家则以他们对城乡二元空间构造、地方风土人情及民众真实心态诉求的深层次了解,探讨究竟何为“美好”乡土的愿景,提供领导与乡民皆未必能“明确知悉”的具体蓝图。此外,在文学叙事的层面,这类“智囊”型的专家往往承担起对读者进行相关知识普及,以及对文本中各色人物的言行进行解读的功用,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作家在作品中特意安插的、对创作意旨进行说明的“传声筒”,其言谈承载着作品在哲思层面的诸多升华与提炼,暗含着作家对宏观问题的思索。

第三类“乡村外来者”受资本驱动,他们进入乡村的动机与前两类判然有别——无论“政府”还是“知识技术”,均胸怀令此地“振兴”“宜居”的宏大抱负,但资本下乡却以逐利为目的,只要能通过土地的征取谋得经济收益,本土的村民生计、生态破坏等问题一般不会纳入资本家们的考量范畴。《经山海》中的顾总、梁总、娄婷婷等作为资本代表下乡圈地,进行所谓的旅游开发或渔场建设时往往唯利是图,此种行径时常对乡村产生负面影响。在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诸多“返乡”“下乡”[①]的非虚构作品中,“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圈地占领农田,使河流改道影响灌溉,“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建了一些与村庄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破坏乡村自然生态等情状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呈现[②]。第三类以资本输送/吸纳为核心诉求的下乡者与前两类形成复杂的对峙格局:乡村的发展在客观层面需要资金注入,这使《经山海》中的顾总、娄婷婷等一方面成为干部们致力于“使用”和团结的对象,另一方面又须在必要的时刻与之进行对抗和斗争。当梁总要求“香山遗美”石屋原址的住民们迁走之时,干部吴小蒿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地表示自己“向石屋村的干部群众作过调查,他们不同意迁走,不同意改变石屋原貌,我认同他们的态度。‘香山遗美’是他们的祖先留下的动人故事,是一笔精神财富,应该永远纪念并传承下去”[③]。象征权力、知识、资本等各色要素的下乡者们,在文学作品中分别以进攻者、保卫者、代言者等种种形象呈现,彼此进行角力或是协作,并以几方相互磨合、调整、妥协的“最终合力”,决定了宝水村、石屋村等村落之后发展的整体走向。

第四类“乡村外来者”以“教师支教”为代表,对于《宝水》中的肖睿、周宁与《神圣婚姻》中的程田田而言,这些教育背景良好的青年下乡多源于“政、教、资”(政府、高校、企业)的扶持与引导。“现在大学生下到乡村支教已经制度化常规化了”[④],由“大学生”所表征的先进知识与文化氛围,往往依托于政府、企业等设立的支教项目、志愿者项目等进驻乡村,他们不如第一类人物对政策领会得那么深入,不如第二类人物对知识技术掌握得那么充分,也不如第三类人物对资本的牟利有那么明确的认知,但他们身上往往三要素兼备,且拥有“改变世界”的无穷热情,并由此生发诸种城乡价值观念的碰撞与改变。这些外来青年的“支教”绝不仅停留于对乡村中小学“提升学习成绩”的教育资源补充,毋宁说是以此作为令乡民喜闻乐见的载体,借之潜移默化地将大量城中新鲜理念与先进技术注入乡土。《宝水》中的肖睿、周宁以“辅导暑假作业”全部免费为名,真正致力践行的却是对乡村孩童的生命深层教育、性教育启蒙与性知识普及以及“基础艺术教育和心灵疗愈”的密切融合。这些看似凌空高蹈的观念性话语,借助长者九奶发话的力量以及乡民们对大学生所表征的知识的天然敬畏,终于在乡村中生根落地——九奶一句“人家这大学生好文化,按章程讲的,咋能没用。想想娇娇的事,那不是例?”[⑤]使向来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性教育在宝水村中被默许。《神圣婚姻》

①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对湖北丰三村这部分的书写,是作者以久居城市的儿媳身份,随着丈夫回到丈夫的家乡,因此有别于常规意义上的“返乡”,更多的是打量陌生乡村的“下乡”意味。

②参见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南京:译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16页;王磊光:《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页。

③参见赵德发:《经山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82-292页。

④徐坤:《神圣婚姻》,第237页。

⑤参见乔叶:《宝水》,第354-360页。

中的程田田更发动亲朋好友等多种人脉资源，为支教所在的坝田村建立了5G信号基站[①]。下乡的青年们“成事”在现实生活中远非文学作品中这般容易，然而青年往往意味着希望，“支教青年”作为政府、知识与资本三重复合的未来理想化投射，在《宝水》《神圣婚姻》等文学作品中通过周宁、程田田等呈现的成功图景，或许更多是一种美好愿景的表达。在此，作品中村庄的乡建叙事与城中青年的成长叙事紧密结合，成长小说中青年人“启蒙—受挫—超越”的叙事模式，成为大量乡村建设的伴奏曲，外来者的多种力量亦经由新生代青年三相缔结，使先进设施、知识结构、文化观念等在乡土全方位地开花结果。

第五类“乡村外来者”并不具备明显的政治性、生产性要素，他们往往基于生存困境、情感认同、身心疗养等林林总总的个体现实需求来到乡村，如《宝水》中童年在福田庄长大，因失眠而来到宝水村居住的地青萍，下乡之时并无任何组织下派的任务、职业发展的需求与财富增长的野心。他们游走于官方、民众及乡土的各色势力之间，对乡土进行“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全面观察，因其“自发”而使得视角极为丰富多样，人物构形亦不似上述四类存在某种同质化倾向，是新时代文学“乡村外来者”人物画廊中面目最为多元的一个门类。值得一提的是，新时代的许多“返乡”人物经过数十年的城市生活，已具备了“外来者”的双重属性，如梁鸿在“梁庄三部曲”中，反反复复地提及自己作为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已然无法面对农村的厕所，在乡村调查时最想做的就是逃回明亮、干净、温暖和舒适的城里，回到家中洗个热水澡，对乡亲们来说，自己已经是另一世界的人等等[②]。此类下乡的农裔“城里人”往往有着居留乡村的童年生活记忆，并由此为“乡村外来者”的人物形象书写提供了别样深厚的情感发动机制，他们所观测的新时代乡土，往往在文本中自然地构成“童年—当下”的双重叠加空间，人物当下的城中病症成为现代性焦虑的文学隐喻，而皈依童年的“返乡”之举，则多复归于一种具有古典气息的生活方式和心灵安顿，并与乡人存在更多深入毛细血管的情感交互。步入新时代后，以往“知青下乡”等强制性的历史事件已不再重演，基本所有的“下乡”之举，都是以乡村为“出路”的主动择选。他们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感到比起城市而言，或许乡村才能提供某种脱离当下处境的转机，在“乡—城”的能量交换系统中令村庄为己供能。

二、“乡村外来者”的自我价值实现

1989年，吴福辉在评述《人生》《浮躁》《古船》等新时期小说中的“乡下人进城”时指出，高加林、金狗、隋见素等人物，是“背弃了重农、重义、轻利、轻商的旧的生活规范和道德规范，甚至一度背弃了象征那块‘净土’的乡村姑娘巧珍、小水和大喜们，通过扭曲固有的心理行为，悲壮地伤痕累累地走向了城市”[③]。“进城者”们在心理层面从未真正认同都市的观念规范与价值取向，只是基于谋生养家等迫切现实需求，为在城中能够“扎根”，被逼无奈地将深心根植于乡土的、与生俱来的认知结构与情感模式在城中打碎重塑。新时代的“乡村外来者”与之截然有别，他们“到乡村去”，往往为的是经济条件之外的精神需求，此种需求在生存层面并非必要，但在更高维度“美好生活”的层面却必不可少，城中生活有诸多难言之痛，却能在“地母”般的乡村得到抚慰与消解。就上述五类干部挂职、技术支农、资本下乡、教师支教与自发下乡的“外来者”而言，技术支农专家主要获取的是具体乡村经验与田野调查的一手资料，可用以修正、补充其原先的理论框架、知识储备并进而提炼出新的乡建观点；资本下乡主要获取的是农村的土地等资源，并通过层层运作将之转换为资金。在“职业”属性的获益之外，于身心维度有更深层次收获的群体，主要集中于干部挂职、教师支教与自发下乡这三类文学人物。他们或是在人生相对起步的阶段，借助与乡土的价值碰撞改变了自己的认

①徐坤：《神圣婚姻》，第245-247页。

②梁鸿的此类叙述甚是常见，多见于《梁鸿作品集》（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亦见于梁鸿的多处访谈。

③吴福辉：《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上海文学》，1989年第10期。

知甚至人生方向,又或在乡土有更长时段的沉浸式生活,对其有更深的情感依恋与更强烈的“荣辱与共”观念,由是在乡村实现了个人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与超越需要。

就挂职干部而言,萨志山、吴小蒿在表面上都是家庭健全、事业稳定的成功人士,然而其所孜孜以求的“我自己”即其个体存在价值,却唯靠逃离城市走向乡村而得以激活和塑就。挂职的萨志山在“找到自我价值、找到存在感后带来的蛋白质营养”之后显得脱胎换骨,“一个男人一夜之间绽放”[①];《经山海》中的吴小蒿逐步“升官”,在书中历任楷坡镇的副镇长、常务副镇长与镇长,职务上每一点滴的微小提升,都浇铸着她为楷坡洒下的心血与汗水;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年轻的驻村书记潘高峰通过两年基层工作的挂职锻炼,“变得更加成熟,沉稳,有韬略,有主见”,“被评为‘全国优秀驻村第一书记’”[②]。对下乡干部来说,这些外在的升职与评优只是乡村“收获”的附属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乡民货真价实的感激与认可,并由此得到了生命价值实现的真实自我认同。以吴小蒿为例,其种种政绩虽然在短期内略显不公地归于文化站站长郭默、民政所所长袁海波等,但她却收获了由老常一大早到海滩上挖来的“半桶西施舌”所表征的真心实意的感谢,乡村渔民快乐的“满脸堆笑”所给予吴小蒿的温暖,以及发掘了宝贵市级非遗的成就感等多种正向情绪逐步累积,使其在巡视楷坡镇时,内心升腾起一份“庄严而神圣的感觉”,小蒿在城中如蒿草般的“小我”,在楷坡终于成长成了一个“大写的我”、一个“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联通四面八方之“我”,此种个人价值在乡村的实现,根本无法经由原先城中波澜不惊的安逸生活来达成,而吴小蒿亦借此历练完成了从“蒿草”到“楷树”的成长,再行返身面对自己的“城中”处境之时,获得了更多直面现实的勇气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女性基层干部,新时代新人吴小蒿外柔内刚的文学形象,打破了以往文学史上“铁娘子”“高大全”的刻板模式,其生命价值在推进工作、陪伴家人之时,呈现于公私领域“落泪”等诸多感性瞬间,其官职上的小镇长之微,与精神上的心系家国之伟,构成了这一文学人物的内在张力,成为新时代新人“米粒之珠,也放光华”的诗意写照。

相较为人处世已相对成熟的挂职干部,教师支教在《宝水》等作品中呈现的是相当年轻的大学生下乡群体,他们既延续了知青文学对“城乡碰撞”的书写传统,又因时代语境的嬗变呈现出新质素,其个人收获体现在与村庄“碰撞”之后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文化自觉。《宝水》中的肖睿大三,周宁大二,通过“雏鹰计划”等支教项目来到了宝水村,而《神圣婚姻》中的程田田则在留学之后因情感创伤来到坝田村支教,并因工作上的彼此扶持,与驻村第一书记潘高峰共同收获了美好爱情与光明未来[③]。这些青年处于价值观念尚未定型的人生阶段,拥有改变现状的无穷热情与干劲,当年轻的周宁试图在农村少儿间进行性教育时,地青萍劝阻着对周宁说出农村的事“就是这”,周宁“气愤得语速快如打算盘珠子,瞬里啪啦道,就是这就是这,您真喜欢说这仨字儿。不能就是这凭啥就是这必须改变这!”[④]此时周宁的坚执与其说是为了宝水村中的幼儿,不如说是为借此疗救曾被性骚扰而在心头留下隐秘创伤的自己,然而,随着与村民的不断磨合和支教工作有条不紊的推进,临别之际的周宁已极认真地“决定以后跟家长和孩子们保持长久联系”[⑤]。在宝水村、坝田村等处支教的年青人不再只是为了增加乡村基层工作经历,又或为保研之时增添一份独特履历,乡土经验已货真价实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选择,甚至令原先只以“项目”方式置身其间的支教青年,决定要终身与本无关联的村庄保持密切联系,这些青年通过“在城—下乡—返城”间的多重流动,极具主观能动性地实现了城乡资源汲取与自我整合,其精神成长颇具主体掌控性,借助乡村支教经验,令生命维度由此向更为广袤的中原大地敞开,为原本城中生命的相对单薄轻飘,增添了一份独属乡土

①徐坤:《神圣婚姻》,第225页。

②徐坤:《神圣婚姻》,第271页。

③徐坤:《神圣婚姻》,第277页。

④参见乔叶:《宝水》,第354-360页。

⑤参见乔叶:《宝水》,第390页。

的深度与厚度。

“乡村外来者”的诸种收获在客观上虽难以量化，但总的来看，收获最为丰厚的该当是第五类“自发下乡”的群体，以往知青文学的传统下乡者多被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而新时代大量“返乡”的非虚构作品、《宝水》中的地青萍、《买话》中的刘耳等文学人物的“下乡”之举，既非政治动员的产物，亦非浪漫化乡愁的投射，而是个体在现代性困局之中，致力于在乡村重觅个人的生命支点，标志着新时代文学的下乡叙事从“集体被动行为”向“个体生命实践”的范式转型。新时代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了大批“乡村底子，城市身份”[①]的下乡者，地青萍、刘耳等肉身所承载的种种病状，在某种意义上皆是因远离故土而产生心灵焦灼的躯体化症状。村庄令这些各怀心病的都市人得到了千金难买的“心药”，譬如地青萍以现世身处的“宝水”（宝水村名）灌溉心中童年的“福田”（福田庄名），通过为宝水村效力来践行对“福田庄”的弥补性移情，从而由夜夜失眠到终于安睡。

以地青萍为例，她自省城下乡之后，在宝水村进行的建设性活动为主体心灵提供了双重归属感，其既分属现时“宝水”，亦分属于童年成长的、内心牵挂的、致力于斩断这份牵挂却又从未真正如愿的“福田庄”，这在某种意义上承继并实现着奶奶与父亲从未形诸言语的遗愿，即对乡亲们必须义不容辞地予以扶助——“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这一辈，哪能只顾自己”，这句印于《宝水》封底的箴言，在书中由宝水村的九奶缓缓说来，宛若福田庄的奶奶死而复生对“我”亲口道出。宝水村作为福田庄的镜像，“我”在宝水见人见事之时，常常于心中乍然“见己”，九奶回光返照之际对老原道出“回来就好”，令“我”瞬间惊觉奶奶去世前所说的话必定同样为此。通过心灵层面复杂微妙而又顷刻完成的转换机制，人到中年的地青萍对宝水村的九奶尽孝并在其身边入眠，就是对福田庄的亲奶奶尽孝并与其共眠；“我”保护村中长期被家暴的妇女香梅，就是保护往日过年时挨了父亲耳光的母亲；“我”眼见女童曹灿“小大人样”的疼惜，就是在心中照见并投射至数十年前福田庄中那个童年的自己。外来者地青萍为宝水村所有“劳心劳力”的付出，均转化为接续并改善来处之“根”的一份份安顿身心的收获，源于血缘的乡土之“根”终究无法逃避、埋藏和逃离，它时刻在心中提示地青萍等“乡村叛逃者”必须面对，而鉴于过往复杂的创伤累累却又无法真正向福田庄正面强攻式地去“直面”，借助折转迂回地面对宝水，依仗此处地母式的慷慨接纳，与其回馈于地青萍一份份“类乎福田”的周至反应，终于令地青萍解开埋藏数十年的心结，与父系亲属关系以及被此种关系“绑牢”的自己和解，既得享夜夜好梦的安眠，亦终获“知根知底”并携手面对日后人生的伴侣老原，令个体生命终在远离都市的乡土之中得到妥帖安顿。“宝水村”所诱发的，是“福田庄”的童年感官觉醒，地青萍在宝水实现了身心与乡土节律的全方位共振，最终所达成的疗愈并非由外力所赋予，而是主体在与乡村的深度互嵌之中，自发完成了个体精神的重构而使“心病”消弭于无形。

三、新时代城乡叙事中“乡村外来者”的文学意义

“原乡情结”本就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古老命题，其亦时常表现为某种人类共同体“通而不同”的精神追求，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被指定为具有“远大前程”的主人公匹普，“最终还是放弃了伦敦虚假的荣华富贵，回到了童年时住过的普通村落”，这一抉择被当代理论家齐泽克称之为“崇高逆转”（the sublime reversal）[②]。此种“崇高逆转”，今日已成千上万次地发生在新时代中国的现

①乔叶：《拆楼记》，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②齐泽克著，季广茂译：《视差之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放弃都市虚浮的繁华，得到乡村安顿身心的实在收获，在《远大前程》这部文学作品中，“失去遗产，让匹普找到了生活的方式；失去艾丝黛拉，让匹普找到了与自己和解的办法。那个被所有人看作将会拥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最终将一切关于远大前程的虚荣与执念抛在身后，并因此真正获得了自己的前程”。参见王岫庐：《〈远大前程〉：不只是一场“幻灭”》，《书城》，2022年第8期。

实社会中,无数的“城里人”为求贴近土地,有的干脆提前退休回到山村栽树种菜,又或放弃交通便捷的市区公寓而退守于郊野小院,新时代日趋普遍的“下乡”行动往往无关生计所需,更多成为一种主体安顿身心的自由选择,由此城乡之间对立的格局被逐步打破,巨大鸿沟亦渐趋弥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这一再造关系的实践过程,逐步为敏锐的作家所充分摄取并提炼注入文学作品之中。

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而效率为先的大前提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迅猛推进。然而,新时代以来现代化的文学叙事逐步“完成了从城市优先向城乡现代化协同发展的话语转向”①,已然更加关注城乡共同富裕以及外来者对乡村的诸种扶持,如果说1980年代百废待兴的中国改革之时“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②,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力图令之复归于充盈生命温度的“有情”,借助对诸种看似负面——所谓缓慢迟滞、因循守旧等——传统乡村文化基因进行激活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创造出一种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被“时间”“数字”所裹挟而一往无前的现代化图式,套上一份份源于“中国传统”的精神性辔头,令“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显得更为平和、稳健、中正、审慎。

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超过10%的平均速度增长,在极短的时间段里达到历史上最大幅度的贫困减少(从1990年的3.58亿贫困人口降低到1997年的2.08亿),对比同时期俄罗斯以年平均5.6%的速度下降,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末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堪称举世无匹③。时至今日,国家提供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能力,已远非改革开放时期所可比拟,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便不可在发展之时,因追求效率而忽视了“以人为本”的身心关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形态绝非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简单复刻,发展中国家天然具有后发优势,中国以欧美的诸种样态为鉴镜,“当现代化在后现代语境中暴露出内在局限时,传统文化经由现代化本身的中介和激活,又构成现代化自我矫正赖以借鉴的重要资源”④。2023年,邓小燕“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出发,讨论了自然与认同的关系”,在他看来,“北魏时期的山东农民,能以极大的耐心栽培具有审美效果的酸枣篱笆墙。现代化讲效率,鼓励走在时间前面,这与酸枣的生命史是脱节的。这是当前国人自然处境的内在矛盾”⑤。如何令发展所要求的速率,与生命所要求的节律两相协调,或许较诸仿照欧美,不如回到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之中,寻找根属于中国主体的独到解决方案——韩少功提出从城市逆行至乡村的“进步的回退”⑥,而王一川亦提出现代性的“流溯”,即在现实向前流动的同时,文艺作品“同时产生的向后溯洄而寻求稳定性的冲动”,“宛如流水般奔涌的浩荡生活流把人送往难以预知的未来时,个体以回瞥姿态返身求助于传统源头,从中吸取开创新生活所必需的精神资源”⑦。此种古老中国向传统文化回眸的缓慢姿态,作为一种现代性发展“一往无前”的必要

①卢桢:《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②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③参见斯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④何中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文艺的历史语境》,《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4期。

⑤所引为邓小燕的会议发言,见于张永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文学史、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22年度论文奖颁奖仪式暨学术论坛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23年第7期。

⑥2001年,韩少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言时道:“当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我算是一个逆行者,两年前开始阶段性地离开城市,大半时间定居中国南方一个偏僻山区。”当记者问韩少功这是否是“对抗现代化”时,韩少功回答:“我说什么是现代化?我在这里比你在都市呼吸着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洁净的水,吃着品质更优良的粮食和瓜果,还享受着更多的闲适和自由,为什么这不是‘现代化’,而你被废气、脏水以及某些有害食品困扰并且在都市的大楼、地铁、公寓里一天天公式化的疲于奔命倒成了‘现代化’?”韩少功:《韩少功作品系列进步的回退》,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⑦王一川:《流溯的现代性——2012至2022年中国文艺观察》,《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

拮抗，以千年传统的稳定感为人民提供精神层面的安详，由此也能迂回地助推物质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在新时代为“中国式乡土现代化”予以文学赋形的大量作品中，作家们时常不约而同地设计数个“知识分子”“有良好教育背景”类型的人物，令他们从外部进入乡村，深切观测并程度不一地参与乡土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在《宝水》中的地青萍、《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神圣婚姻》中的萨志山外，另在张炜的《艾约堡秘史》等作品中均可见到此种知识群体与乡土本位的缔结，他们携手同心，协力构筑“道德的、理智的、缓慢的、有尊严的乡土中国现代化”[①]。这类“下乡”的知识分子/干部经由新时代作家们的妙笔塑就，已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文学史中几种叙事传统的独特风貌。其一，他们有别于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文化批判的启蒙式书写，鲁迅在其小说与杂文中，对官僚、帮闲、流民等中国社会各阶层灵魂深处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极为深刻的针砭与剖析，其书写空间遍布城（如S城）、镇（如鲁镇）、村（如平桥村），对当代农村题材创作中的“文化批判”主题有着深远影响。不过，新时代作家笔下的“下乡”已不再着力于暴露各类人物深层的精神痼疾，而是以外来者的身份径直介入乡村并力图理解农民的处境、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他们干脆地将自身内化于乡土的处事逻辑之中（如地青萍数次道出“农村的事就是这”），有时甚至借力于各方人马的“逐利”本性，寻求将各色烦难问题更妥帖地予以解决；他们亦有别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诗意化书写——他们见到村民旋柿子“扎个满枝红”、火晶柿子“连枝带叶地多存一些，挂到墙上也是景儿”的时候，比起借之在文本层面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已惯于极务实地将充满诗意的田园之美，迅即地转化为乡民们喜闻乐见的经济收益，即强调农村这些习焉不察之状对城里人“都是景儿”，而“景儿都是钱，都是钱！”[②]；他们甚至同样有别于以柳青为代表的社会历史变革式书写，《宝水》《经山海》等新时代中国乡土现代化的史诗，各自依据河南、山东、四川等村庄内部“挖潜”的地方性叙事开展，以充满独特地域风情的本土特色与细致入微的人情之美，取代了1950年代齐整划一的人民公社叙事，而“下乡”的知识分子、干部们及其串联起的城市人脉网络，亦已毋须经由“下乡”进行“城优乡劣”的强制性改造，而是在能动选择的基础之上，双方彼此自由地择选、磨合并取长补短。由此来看，在上述以鲁迅、沈从文、柳青为代表的三种乡村叙事传统之外，新时代的作家们经由知识分子/干部们由城下乡的“外来者”叙事，已然开创出另一种新型乡村叙事传统，即以乔叶的《宝水》为代表，基于新型乡村建设的劳动诗化复合型叙事。此种叙事，既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叙事有别，也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村诗意化叙事不同，它不再只是对乡土旧有之物的情感投注，此中呈现了大量同步于新时代中“乡村建设”及其“反哺城市”的新风貌，而较诸早年柳青的《创业史》等，又以诸种充满温度的文学细节和鲜活可感的人物形象，令此种制度性融通城乡的合力“乡建”充满了文学可信度与感染力，地青萍的犹豫、踟蹰与渐变等等，作为新时代乡土人物画廊的重要形象显得极为生动立体而扣人心扉，不致再落入梁生宝“反而不如梁三老汉可信”的昔日公式化窠臼。

“中国式现代化”仍在逐步推进，在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而双方取长补短的进程中，城乡既尚留彼此鲜明特性，亦有日趋类同之处。城乡面临着日趋相似的问题——《神圣婚姻》中的孙子洋父母道出：“城里人有一套房，就像农村人有一块地，自个儿有了才心里踏实”[③]；城乡在践行日趋相似的工作形态——城中“白领”根本无法离开电脑、平板与手机三件套来完成诸多文稿、表格与绘图制品，而“随着乡村网络的普及，当代新乡村振兴建设已经提出‘手机就是农具，上网就是耕作’的新智能农业工作形态”[④]；城乡共享着类同媒介的虚拟社区与共同体，如吴小蒿所说，“现实世界

①参见郭帅：《张炜的乡土中国现代化辨析——〈艾约堡秘史〉的一种解读》，《百家评论》，2018年第4期。

②乔叶：《宝水》，第362页。

③徐坤：《神圣婚姻》，第13页。

④张丽军：《新城乡文学——21世纪中国乡土文学新论》，《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加虚拟世界,假作真时,比真更真,人类不像从前那样只是孜孜以求改变世界,而是苦心孤诣地去创造新的世界了"[①]。从"在地"的角度而言,城乡彼此融通互补而渐趋混同,而从"线上"的角度来说,城乡当然存在基于线下身份而在线上同等划定的社群圈层,亦存在根本"不知城乡""不分城乡"的虚拟空间。目前文学与现实中的城乡关系尚处于不断发展再造的进程之中,尽管无法下定断语,但通过新时代"乡村外来者"联结城乡二端的诸般作为与种种心迹来看,新时代长篇小说中的中国城乡关系已由界限相对分明的二元结构转向交融共生,"乡下人进城"与"城里人下乡"的人物主体均依据切身需求,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各取所需,呈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趋向平等的新阶段。

四、结 语

新时代的种种新山乡巨变,正迫切地呼吁作家们以如椽巨笔予以多方位、多角度的呈现,然而优质文学的生成,却又毕竟仰赖漫长时间的沉淀,如何调和"情感积淀"与"同步时代"之间必然存在的时间差,是长期以来令不少作家感到困扰的问题。在《经山海》《宝水》等诸多新时代文学精品中,通过"乡村外来者"目睹的种种图景塑造与由此唤醒的心灵波澜,不断向个体的记忆深处与"新时代"之前的"新时期""新中国"进行历史之维的扩张,既为文本提供了在"今昔城乡"间往来如梭的必要张力,亦赋予了作品以更为丰厚的情感容量与心智容量。此中以获得茅奖的作品《宝水》最为典型,新时代的"美丽乡村"豫中宝水,在地青萍、孟胡子、周宁等外来者与村人同心协力的建设之下,显得那样热气腾腾与蒸蒸日上,而在同步于时代"事件"向前线性推进的河床底部,却仰赖地青萍连绵不断的记忆反刍与"见今知昔""忆昔鉴今""今昔对比"的深长感触,赋予整个文本以扎实丰厚的情感底色,并支撑起文学作品"感人至深"的坚实骨架。从生理意义而言,个体的生命历程从无"中断"一说,即便故去,在后人记忆与群落繁衍的层面仍将连绵永续,幅员广袤的新时代中国,同样向"新世纪""新时期""新中国"乃至更早的传统历史记忆敞开,当下的城乡关系必然接续并运用着往日种种资源遗产。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城乡关系",正通过作家化用往日情感沉淀的遗产,才令当下的图景描绘焕发出更加浩大的能量。在这一意义上,往昔相对负面的情感经验亦是当今文学可贵的隐形资源,新城乡文学从农村人"由乡进城"到外来者"由城下乡"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但是对当下时代的精准感应与有力呼应,亦是对此前厚重乡土文学、人文传统与情感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由此讲述的新时代农村题材的"中国故事",当会接续往日乡土文学的辉煌成就,更进一步地成为世界文学的出色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周 南]

①赵德发:《经山海》,第228页。